

# 世纪大抢救：三峡文物保护的“中国答卷”与未来之路

詹长法

## 引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明守护

1994年，当长江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从图纸走向现实，一项同样浩大而紧迫的使命也随之启动——抢救即将永沉江底的千年文明印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而是一场规模空前、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大迁徙”与“大保护”。从规划启动到专项终验，历时20余年，这场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文物保护工程”的行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累计完成1128处文物保护单位，出土文物超25万件套，364处地面文物通过搬迁、加固、原地保护等方式得以留存。

如今，站在工程收官与后续保护利用的新起点，我们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不仅是为了铭记数以万计文物工作者的艰辛付出，更是为了梳理经验、审视不足，探寻一条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活起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近期，一场汇集了全国顶尖文博专家的研讨会，系统回顾了三峡文物保护的丰硕成果与深刻思考。

## 规划先行，奠定科学保护的基石

“先规划，后实施”，是贯穿三峡文物保护始终的核心原则。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郝国胜提出，早在工程动工前，《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的编制，就系统摸清了三峡库区文物家底，将1087处文物点纳入国家保护体系，明确了保护对象、方式与经费，为这场“文明抢救战”绘制了科学的作战图。

这一超前规划，不仅确保了文物保护与工程建设同步，更从整体上确立了三峡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后曦教授将保护工作概括为三个阶段：规划保护（1992—1996）、抢救性保护大会战（1997—2010）和系统性活化利用（2010年后）。其中，持续十余年的“三峡考古大会战”堪称壮举，来自全国的考古力量在此汇聚，实现了峡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从无到有”的突破，构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更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巴、楚、蜀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的生动历史。

## 多学科协同，科技赋能抢救实践

面对类型复杂、数量庞大、病害严重的石质文物，传统的保护方法已力不从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阮军总结，库区受淹石质文物达275处，超过地面文物总数的一半，包括古建筑、石窟寺、摩崖石刻等，年代从汉晋延续至近代。它们普遍面临水位涨落带来的干湿循环、渗水溶蚀、生物侵蚀等复合病害。

挑战催生创新。保护工程汇聚了考古、历史、建筑、地质、材料、化学、工程等多学科力量，形成了一套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精细化保护体系。

诊断更精准。超声波检测、X射线衍射、三维激光扫描等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文物做“CT”，精准探查内部裂隙与风化程度，为“对症下药”提供依据。技术更多元。从激光清洗、微粒子喷射到环保型化学清洗，清洗技术不断升级；加固材料从传统石灰、环氧树脂，发展到渗透性、耐久性更优的有机硅、纳米材料；针对盐害这一“石质癌症”，创新应用纸浆吸附、电渗法等脱盐技术。

方案更创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白鹤梁题刻的保护。这座刻有1200多年枯水记录的“世界第一古代水站”，面临永沉江底的命运。最终，中国工程师以“无压容器”水下原址保护方案，在题刻原址修建保护壳体，通过净水水平压系统，使其免受冲刷与高压破坏，并转化为可参观的水下博物馆，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完美结合。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杨昌鸣回顾，这一方案的选择与后续管理规划，



三峡工程

是维持文物真实性并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

## 分类施策，经典案例诠释保护智慧

根据文物价值、保存状况与淹没影响，保护工作采取了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等分类施策模式，诞生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典案例。

原地保护的典范：除白鹤梁外，忠县石宝寨的“护坡仰墙”工程，使其在蓄水后成为江中“盆景”，保持了原有的景观风貌。

搬迁保护的杰作：云阳张桓侯庙（张飞庙）的整体西迁，是规模最大的搬迁工程。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朱宇华在回顾其搬迁历程时说，这不仅是建筑的位移，更是对文化遗产“忠义勇信智”精神内核及其作为三峡人文景观核心组成部分价值的深度认知与实践。工程最终选择了能延续其历史空间关系的南岸迁建方案，并创新性地保留了部分原有屋顶瓦面，成为将价值理论融入复杂工程实践的典范。

汉代石阙的保护则集中体现了不同策略的运用。雅安高颐阙通过系统性环境整治，恢复其历史格局；绵阳平阳府君阙经历了落架大修、抬升和保护建筑建设，其早期化学保护材料的长期效应为行业提供了宝贵数据；而忠县丁房阙、无铭阙因三峡蓄水实施异地搬迁，其教训也警示后人：保护工程应力求“一步到位”，避免文物在临时状态下长期暴露，加剧损害。

地下文物的丰收：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系统阐述了后续工作的十大核心学术价值。例如，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不仅建立了连续五千年的文化序列，更通过盐业考古等多学科手段，首次证实其为东亚地区最早的规模化制盐中心，极大深化了对古代资源利用与社会复杂化的认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的研究，揭示了峡江地区作为巴、蜀、夔、楚等多文化交汇走廊的独特地位。

## 成果丰硕，从“抢救”到“活化”的转型

经过20余年努力，三峡文物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学术研究跨越式发展。大量考古发现填补了区域历史空白，出土文物极大丰富了长江文明的内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智彬对中坝遗址的研究，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从《三峡文物保护》大型图录到《雕刻的峡：三峡石刻研究与保护》等专著，系统性成果不断涌现。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工程博物馆馆长高飞介绍，博物馆通过实物、文献、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系统呈现了文物普查、

抢救发掘与保护工程的全过程，致敬了一线文物工作者。保护理念持续演进。从初期的“抢救性保护”为主，逐步转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并更加注重文物价值的挖掘与活化利用。目前，已有65处文物点被评为3A级以上景区，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等成为文化地标。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更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出移动博物馆，让文物“走出去”。

## 反思与展望，迈向系统性保护新阶段

辉煌成就背后，亦有值得深思的经验与教训。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詹长法直言，当前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库区石质文物数量庞大，病害复杂，专用保护材料研发存在短板，新材料新技术的长期耐久性需持续监测。部分文物在保护建筑建成前长期露天存放，以及一些早期干预措施（如不当的化学保护、过度的抬升）带来的影响，都提示我们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展望未来，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正步入新阶段。深化系统性、预防性保护。未来的重点将从集中抢救，转向对已保护文物的长期监测、日常养护和风险预防。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和监测预警系统至关重要。推动科技深度融合。继续研发更环保、更耐久的新型保护材料，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测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加强价值挖掘与“活态”利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新阐释和展示方式。利用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推动文化旅游、文创开发与乡村振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度融合，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真正“活起来”，成为滋养当代、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

## 结语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是一部新中国文物工作者在时代巨变前书写的壮丽史诗。它不仅是与江水赛跑、抢救珍贵遗产的物理工程，更是一次对文明脉络的梳理、对保护理念的升华、对多学科协作能力的极限考验。从规划蓝图的擘画，到水下博物馆的创举，从考古大会战的汗水，到数字化展示的创新，每一步都凝聚着智慧与匠心。这份厚重的“中国答卷”，为全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东方经验与智慧。面向未来，守护好这份沉淀在峡江山水间的民族记忆，让其永续流传、熠熠生辉，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

# 基于文献的图谱量化分析我国大遗址保护研究进展与趋势

由蕊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其不仅具备文化遗产所赋予的文物性和资源性，还呈现出区域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因此，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自从“十一五”以来，这一课题备受关注，成为极具社会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向，学界也积极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致力于推动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采用CiteSpace与VOSviewer，对中国知网(CNKI)中与大遗址保护相关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包含有效样本文献957篇)，旨在探析近年来大遗址保护的研究进展与趋势，为该领域的实践研究提供启示。

## 文献基础数据统计分析

### 文献发表量及研究经费来源分析

对CNKI收集到的957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05年为研究的关键年份，2005年前文献零星发表，2005年后总体上升，2009年实现翻倍增长。研究经费来源分布比较分散，文献量的快速上升与国家政策法规紧密相关，特别是2005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首次从政府层面对大遗址进行定义，大遗址保护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

### 发表机构分析

利用CiteSpace对957篇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发表文献大于10篇的机构有6家，其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长安大学建筑学院具有较高的中心度。同时在研究机构合作图谱中可看到许多其他单位参与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遺產研究院等，这些单位依托其独特的专业属性及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为大遗址保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 大遗址保护进展

将957篇文献数据导入VOSviewer中，利用其关键词“共现”和密度视图功能分析研究主题的演变，可发现近30年大遗址保护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大遗址的保护规划，包括关键词：保护规划、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整体保护等。“鸿山模式”为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实践经验。同时，强调历史文化价值特色整体研究方法，注重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实现多层次整体保护，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等建议，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指导方向。

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发展之间的保护模式，包括关键词：乡村振兴、保护与利用、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生产。李向明等运用文化空间生产理念，探讨南昌西汉海昏侯国遗址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问题。阳洛璐等以战术城市主义理论为支撑，探索适应性的汉长安城遗址区闲置用地活化利用策略。

大遗址保护展示，包括关键词：保护展示、真实性、景观设计、遗址展示。于焱等以临淄齐景公墓殉马坑遗址博物馆为例，将本体展示、复原展示、模拟展示、标识展示、陈列展示、沉浸展示等展示手段融会贯通，全面真实地展示遗产本身价值。

大遗址的价值与利用，包含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价值等。周波等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个维度解剖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价值，提出考古化保护、旅游化保护、研究化保护、数字化保护、公众化保护、法规化保护等六大保护路径。余洁等通过大遗址考古内容数字化、文物资源信息化和数据库平台化实现与元宇宙虚实交互创新的路径，指出元宇宙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应用前景，实现大遗址活化与元宇宙用户价值共生共创，加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

### 研究热点及变迁

关键词时区图可反映研究热点的变迁过程。利用VOSviewer绘制大遗址保护研究关键词时区图，同时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突现分析功能对量化分析不同研究热点的热度和时间变化，以期探究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化，结合关键词时区图及关键词的突现指标对1997年至2025年大遗址保护研究进行阶段划分，大遗址保护经历了基础保护、实证探索、协调发展等不同发展阶段。

### 保护研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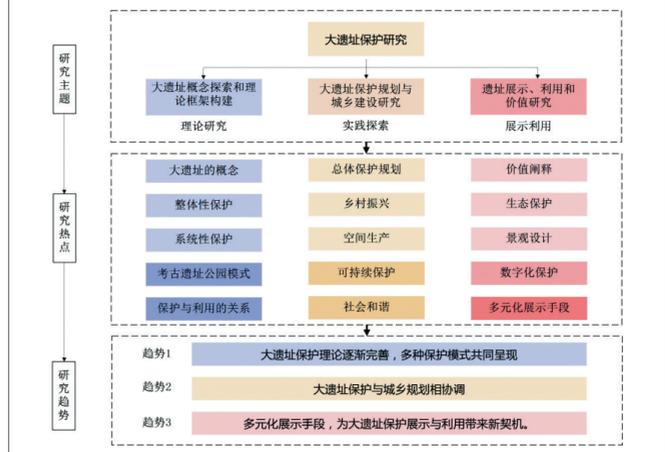
大遗址保护研究在经历了大遗址概念探索和理论框架构建，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城乡建设研究，遗址展示、利用和价值研究三个发展阶段后，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中心和前沿分支。基于近30年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发现目前已经形成理论研究(大遗址概念探索和理论构建)、实践探索(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城乡建设研究)和展示研究(遗址展示、利用和价值研究)三大研究主题。

主题一，大遗址概念探索和理论框架构建。作为大遗址保护研究的基础，以前多集中在大遗址的概念、保护理论和保护利用的探索。大遗址的概念凸显出“价值优先、规模与格局并重”的复合属性，呈现价值(实证文明)、形态(规模宏大且格局完整)、保护(难度大需协同)三维核心特征，同时构建起以跨学科理论为支撑，涵盖价值论、保护论、利用论、管理论的多维度框架，彰显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实践中需强化系统性与协同性，整合跨学科力量形成“发掘—保护—利用—整理—研究”一体化链条，深化价值研究以凝练时代内涵，统筹专业技术力量形成科学方案，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将保护利用纳入区域发展全局，实现多重共赢。

主题二，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大遗址保护研究的核心，大遗址既是具有突出文化遗产资源和资产特征的城市地理单元，又是兼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多维复合场域，亟须以系统思维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应从文化生态位视角构建协同路径，通过生态位分离互补、文化生态链串联及生态缓冲带共建，结合乡村遗产活化的整体性、适应性策略，将遗产价值转化为城乡发展的独特资源，通过空间重构、产业升级、治理创新，使大遗址从限制发展转变为赋能发展，最终实现文化遗产永续传承与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双向赋能。

主题三，遗址展示、利用与价值开发。作为大遗址保护的多种呈现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价值引领—创新驱动—社区共享”的生态系统。通过真实性展示与科技赋能相结合，让遗产展示从静态展示到沉浸式体验的创新；通过文旅融合与社会参与相促进，使开发成果惠及公众，推动地方发展；通过价值转化与风险管控相平衡，确保遗产在活态中永葆生命力，最终实现“保护遗产本体、传播文化价值、赋能区域发展”的三重目标。

（作者单位：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



中国大遗址保护研究趋势分析示意图

本版责编：张 硕 何文娟 陈颖航

# 赓续隋唐中轴文脉 推动城市内涵发展

王鹏杰 朱宇强 程晨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 朱泽楠/摄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要求“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隋唐洛阳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对称”模式的典范之一，其规划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乃至东亚都城的建设，在城市发展史与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保护传承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改善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品质，赓续城市文脉，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 赓续千年文脉，彰显中轴气象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全长约18公里，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中轴线之一，也是一条贯穿现代城市中心区的古代都城中轴。它以伊阙(龙门石窟)为起点，经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宫城区(应天门、明堂、天堂)、玄武门，直至邙山脚下，形成“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的宏大格局，体现了“象天法地、因势利导”的传统营建理念。

这条中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择国之中而立官，择官之中而立庙”，更通过精确的空间控制实现了功能分区与生态协调。天街宽达140米，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是当时世界上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之一，既是皇家礼仪通道，同时也能满足居民的交通出行需求，展现出高度的城市治理智慧。

这条跨越千年的城市中轴线，并非作为孤立的景观存在，而是串联起多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同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书”，将不同时代的文化层叠整合于同一空间序列之中，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脊梁。

## 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幸福产业

保护利用隋唐洛阳城中轴线，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

洛阳遵循在确保遗址安全的前提下，建设遗址公园、博物馆等设施。实施了天街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明堂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将中轴线沿线的重要遗址节点串联成线，形成了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展示带。

洛阳依托中轴线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培育了“盛世隋唐”IP，打造了“夜游天街”等特色文旅品牌。这些举措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提升了游客体验，带动了沿线及周边商业、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消费提质升级，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切实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幸福产业。

同时，鼓励创新动漫、影视、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天门印象”灯光秀、“唐宫乐宴”演出等活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

## 推动共建共享，增进民生福祉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纵贯南北，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社区分布集中、人口密集，串联起龙门石窟、定鼎门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隋唐城遗址博物馆等多个重要历史文化地标、旅游景点及城市公共空间。洛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已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享路径。

在推进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保护传承过程中，市政府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中轴线沿线城市片区更新，优化城市路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了一批精品文旅街区和完整社区，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空间建设的有机结合。

同时，洛阳各文化机构还连续举办“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文化遗产宣讲进社区”“中轴线文化研学”等活动，邀请市民、青少年学生等近距离体验考古发掘、参观文物修复、参与非遗实践，增强公众对中轴线文化价值的切身认识和保护意识，提升了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城市归属感和参与成就感，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中轴线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

未来，洛阳市将通过串联文旅资源、带动就业增收、开放公众参与，形成文化遗产与民生改善互促的良性循环，为市民打造休闲漫步与感受历史的文化新空间。

（本文系洛阳市社科重点项目“隋唐洛阳城中轴线景区联动与城市文旅新品牌构建策略研究”研究成果，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黄河文明与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洛阳理工学院 洛阳博物馆）